

PAPERS

ON

SHANGHAI

STUDIES

林克主编

上海研究论丛



第十七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研究论丛

第十七辑

主 编
副主编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黄美真 沈似鹏
朱敏彦 (常务) 书 章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
上 海 研 究 中 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海研究论丛.第17辑/林克主编;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研究中心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ISBN 7-208-06661-2

I. 上... II. ①林...②上...③上... III. 上海市—地方史—文集 IV. K29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5055 号

责任编辑 杨柏伟

特约编辑 李彦涛

封面设计 闵 敏

上海研究论丛(第十七辑)

林 克 主编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上海研究中心 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625 字数 280,000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6661-2/K·1276

定价 30.00 元

编者的话

《上海研究论丛》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办,1988年5月创刊,是专门研究上海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历史的具有较高品位的学术性丛书。1991年9月起,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和上海研究中心合办。《上海研究论丛》编辑工作现由市方志办副主任朱敏彦主持,《上海研究论丛》编辑部设在市方志办方志编纂处暨委办联络指导处,编辑部负责人由该处处长梅森兼任,李彦涛具体负责日常编辑工作。

《上海研究论丛》遵循市委老领导、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原主任钟民在创办时提出的办刊宗旨和要求:"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们编纂出版《上海研究论丛》,我非常赞同,希望它成为研究今昔上海、积累珍贵史料、研究方志理论的一块欣欣向荣的园地。""上海是一座文化发达的城市,拥有一大批各个方面的专家、学者。全国关注上海、研究上海的专家、学者也很多。我们要十分重视他们的研究成果,虚心求教,争取他们成为《上海研究论丛》的积极的作者和顾问。""我们也要汲取海外学者在上海研究中取得的优异成果。我希望《上海研究论丛》成为我们了解国外对上海研究的一个窗口。"钟老的教诲,我们将始终遵循,一辑一辑地坚持编辑出版下去,辛勤耕耘,努力浇灌这块上海研究的学术园地;同时,竭诚盼望专家、学者关注上海研究,源源惠赐佳作,共同培育这块园地,使之不断结出丰硕的成果。请作者汇稿时顺附文字标题的英文翻译。

编辑部电话:(021)62995216;联系人:梅森、李彦涛

通讯地址:上海市西康路1369号4楼;邮政编码:200060

《上海研究论丛》编辑部

2006年12月

目 录

· 政 治 ·

-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的政治宣传工作及其社会功效
..... 王小莉 李春峰(1)
- 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策略研究
..... 曹婧好(18)

· 经 济 ·

- 早期中国通商银行的几个金融案述论 陈礼茂(44)
- 上海近现代西式楼宇的建筑过程及解析 梅 森(56)
- 上海传统民居与里弄建筑 李彦涛(89)

· 文 化 ·

- 上海近代新闻教育的发展 马光仁(104)
- 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控制《申报》、《新闻报》始末(1945—1946
年) 古晓峰 赵宗强(127)
- 民间艺术“小热昏”盛衰 俞成伟(136)

· 社 会 ·

- 上海侵华日军“慰安”制度的建立与推广 华 强 衣明玉(151)

日伪时期上海的公共健康管理初探·····	彭善民(165)
试论救捞行业的事业性质及其他·····	杰 锋(174)
近代化过程中弱势群体的慈善救助	
——以民初上海新普育堂为视角(1912—1916 年)	
·····	何孔蛟(191)
近代上海华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疫病救治事业探析	
——论疫情之下国家与社会关系·····	刘雪芹(202)
略论民国时期上海的乞丐问题·····	罗国辉(229)

· 团 体 ·

从比较中看浦东同乡会·····	郭绪印(242)
20 世纪初上海美国妇女公会述论 ·····	胡宝芳(253)

· 历史地理 ·

明清松江府地区的插花错壤及影响·····	林 涓 冯贤亮(267)
----------------------	--------------

· 地方志 ·

《蒲溪小志》前言·····	沈渭滨(281)
---------------	----------

· 史海钩沉 ·

杜月笙与中汇银行·····	顾良辉 任冉冉(291)
---------------	--------------

· 资料整理 ·

20 世纪末上海姓氏人口调查报告 ·····	许洪新(307)
------------------------	----------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的 政治宣传工作及其社会功效

王小莉 李春峰

政治宣传是政党沟通社会、动员社会的重要手段,它在向民众传输政治价值、强化社会对政党的认同度、加强政党与社会间的联系等方面都具有内在价值。中国共产党在 85 年历程中,始终注意将政治宣传作为联系社会的方式。尤其是革命战争时期,作为革命党的中国共产党更是为了实现国家和人民的独立而积极地动员社会各方力量投入到各种斗争中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尤为典型,其宣传形式的多样性、宣传内容的切实性、宣传效应的深入性都足以引鉴于今。本文根据可靠的史料,以上海地下党的政治宣传工作为考察重点,试图系统分析地下党政治宣传的具体状况与社会效应,从而描绘出党与社会沟通的一个层面。

一、政治宣传是抗战时境下上海地下党动员社会的重要策略

从政治传播学理论来看,任何一个政党要想赢得社会的支持,必须通过各种舆论、会议、文件、活动等方式向群众宣传其纲领、政策与指导思想。这一宣传的过程也即是政党进行政治社会化的过程。而政治社会化的效力正在于将政党的政治态度、理想信念、政策方针等传导给民众并内化为行为规范和向导。抗日战争环境下,革命党要想取得抗战的胜利,必须发挥政治社会化的功能,动员社会中可联合的力量抵御侵略。毛泽东就曾说道,“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

毫无疑问将不能取得胜利。”^①因此，革命党必须统一民众思想，向社会民众宣传抗战的政治目的，从而激发社会各方面力量抗日的动力。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也确实将政治宣传作为其动员社会的基本策略。为了做好群众的抗日宣传工作，党中央曾指示各地党组织，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向前线官兵、后方守备部队、沦陷区人民、全国民众，作广大之宣传鼓动”^②。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动员广大民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把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发挥出来，同时还需要扫除十年内战期间国民党反共宣传在群众中留下的阴影，使广大民众了解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坚决抗日、为人民大众真正谋利益。而上海是当时全国的经济、政治中心，拥有 80 万产业工人^③，因此，如果把上海地区几十万的工人群众宣传鼓动起来，那么将对争取抗战的胜利具有重大的作用。这一点正如罗兹·墨菲所言：“上海曾被说成‘在中国而非属于中国’……对中国人的精神而言，上海及其他条约口岸是一道深深的屈辱的伤口……作为一种反作用，上海在刺激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兴起和树立使中国摆脱外国压迫的决心方面起着主要作用。”^④为了加强对上海地区群众工作的领导，1937 年 11 月上旬，中共江苏省委员会在上海正式成立。但中共江苏省委正式成立没几天，就面临着上海沦为“孤岛”的复杂局面。密切注视着时局发展的中共江苏省委估计到：“今后我党在上海处在一个新的环境中：日本在租界势力是加强了，租界当局将必然帮助日本镇压抗日运动，但日本对上海的占领是更增加了英美法对日本的嫉视与相互间的矛盾，而不能完全百分之百的执行日本的每一个意旨，但我们的环境必将

①《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47 页。

②中共中央宣传部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党的宣传工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 页。

③张祺：《上海工运纪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 1991 年版，第 55 页。

④[美]罗兹·墨菲：《亚洲史》，海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30 页。

日益恶劣。”^①并认为,随着环境的恶化,群众的民族仇恨及抗日情绪会因为亲身受到敌人所加给他们的种种痛苦而提高,这是本质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抗战失利与日伪势力的威胁、压迫、恫吓与欺骗下,人们普遍地充满着恐惧、失望、偷生以及苦闷心理。如果不能及时把握这种高涨的情绪,不能尽力来组织群众的日常斗争,那么群众的抗日情绪,是会被悲观失望、恐惧与苦闷心理所麻痹或淹没的。

根据中央的指示并结合上海的实际情况,1937年11月19日中共江苏省委作出了《关于上海陷落后上海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分析上海失陷后的形势时指出,日本在侵占上海后将会继续进攻中国,“三个月的抗战与日寇有进无已的进攻及屠杀,已更加普遍的激起了群众的抗战情绪”。由此,“在今后新的环境下,上海党的基本方针应该是继续巩固与发扬群众抗日斗争情绪,发动与组织群众的反日斗争,一直到反日的游击活动。在这些工作中,更加扩大加强严密群众组织与党的基础,充分准备力量与全国抗战配合,争取最后摧毁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恢复上海”^②。12月29日又发出了《关于新环境下上海组织工作的决定》,指出,上海失陷后,党的工作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环境的转变与需要,党的组织群众的方式与形式上,在领导群众斗争艺术上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运用上均须执行转变”。《决议》强调“用各种各样的形式与方式,如友谊的、经济的、学术的、娱乐的、互相的、地方性质的、带封建性质的,以至宗教的形态出现……依据着这样的形态来注入抗日反汉奸的内容”^③。

上海地下党依据省委的两个文件精神,结合上海民众的思想实际状况,开展了不拘一格的宣传工作。关于宣传工作的相关方针,中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94页。

②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1949)》,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453页。

③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1949)》,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455页。

共江苏省委曾经就“支部怎样做宣传工作”作出了专门的指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确定把握着支部宣传对象，支部要切实了解，观察群众的生活与其对抗战认识的信心，情绪倾向，文化水准等”；“正确规定宣传目的，支部任务，观察群众情绪，规定宣传目的，或是提高抗战情绪增加抗战的认识，坚强抗战胜利的信心，或是了解和和平倾向，粉碎疑虑心理，又或是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等”；“配合周围实际情形，具体规定宣传内容，如扼要报告战争消息，重要政治事件解释和主张，打击汉奸荒谬言论，宣传群众当兵，群众生活如何改善等”；“适当的分配同志去宣传，分配善于讲话的同志到有组织的群众中会议上、公共场所去宣传。或讲演，分散同志在无组织的群众中进行个别宣传，推动被宣传的群众用各种方式宣传”等等。^①

二、抗战时期上海地下党政治宣传工作的基本形式与内容

（一）多样的宣传形式

革命党通过政治宣传动员社会的效果，不仅取决于政党的能力，还取决于政治宣传形式是否与社会客观实际相契合。抗日战争时期，上海的政治形势虽然变幻莫测，但地下党已与社会中的工人、学生、文化工作者等有了广泛联系，党在逐步提升其社会影响力的同时，利用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政治宣传。

1、口头形式和文字形式

口头形式。这种形式是地下党在抗战时期采用的常见宣传形式。它以口头宣传为主，多是以面对面的方式出现，具体有以下几种类型：（1）演讲、游说、讲座报告。（2）座谈讨论。它是一种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的宣传形式。（3）个别谈心和对话活动。这是一种更为深入细致的宣传方法。该形式虽然只是向一个人或少数人进行的宣传工作，但它能起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沟通民众内部关系，从而起到

^①原件藏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藏品号：A3-176，转引自《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98—599页。

影响一大片的作用。如松江女中学的地下党员通过学协小组指导党员和学协成员固定联系几个积极分子和群众,同她们交知心朋友。在交谈过程中,针对有的同学家乡遭日军轰炸,有的同学亲属被炸死,也有的同学姐姐因封建包办婚姻而自杀身亡等等具体问题,同她们个别谈心和对话,借给她们有关进步的书刊,并结合她们的思想进行深入的教育,使她们认识到: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就谈不上妇女解放;只有消灭剥削和压迫,妇女才能真正得到解放。^①

文字形式。这种宣传形式可以使宣传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是宣传工作的最基本形式。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报纸、图书、期刊。抗战初期,上海地下党领导和推动创办了《救亡日报》、《抗战》三日刊、《救亡周刊》、《救亡漫画》等大量救亡报刊。孤岛时期,《每日译报》、《文汇报》、《导报》等大批出版发行机构,先后出版了《鲁迅全集》、《西行漫记》、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的著作以及大量进步文学读物,有效地建立起党的舆论阵地,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业绩,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和提高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威望提供了重要的媒介。(2)决议、指示、文件。这种形式同社会现实和群众利益联系得比较直接,更易引起广大干部群众的注意,并且该形式更为明确地提倡什么、要求什么、反对什么、禁止什么,具有文字简练、言简意赅的优点,具有较好的宣传效果。如抗战初期地下党到马路、里弄、学校、工厂等处宣传、散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从而使民众对党的全民抗战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很好的了解。(3)黑板报、壁报、简报。这种形式短小精悍,民众可以在工作娱乐和休息的间闲时间进行阅读,也可以发挥宣传教育的作用。

2、文艺形式

文艺形式是一种直观的靠文字艺术的感染力进行的宣传形式。

^①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49页。

抗战时期,上海地下党十分注意采用艺术性的宣传方式,以达到激发群众的抗日斗志和坚定抗战信心的目的。这一点正如香港学者洪长泰所说,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深明宣传的力量,在争取民心方面,官方往往从群众最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下手,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把新的政治内容注入受欢迎的艺术形式中,吸引观众,赢得民心。^① 因为通俗性的大众艺术如杂文、漫画、戏剧、歌曲等,能极大地调动起群众的感情共鸣,是提高群体凝聚力的重要手段,能激发群众强烈的义愤^②。为此,上海地下党主要通过开展群众喜闻乐见、富有感染力的戏剧、歌咏、诵诗表演和文艺通讯运动等文化活动,在活动中体现抗战的时代主题,让广大的人民群众在艺术的感染力中高扬起抗日救亡的爱国意识。如当时的一些剧团经常演出《放下你的鞭子》、《难民生活》、《往那里逃》、《大家一条心》、《报仇》、《再上前线》、《省一粒子弹》等等有抗日内容的剧目,激发群众抗日救亡的热情。有一些街头剧往往是演员与观众融为一体,有的群众还作为剧中的角色参加演出,加强了演员与观众、台上与台下、剧中与剧外的心灵碰撞和感情交流,效果逼真,形象感人,有效地渲染了抗战的气氛。^③ 革命剧作家田汉曾这样评价过戏剧对抗战的作用:“中国自有戏剧以来,没有对国家民族起过这样伟大的显著的作用,抗战以前戏剧尽了推动抗战的作用;抗战开始以后,戏剧又尽了支持抗战鼓动抗战的作用。”^④ 除了剧团演出外,歌咏活动也非常的普遍,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一些工厂、学校等基层部门纷纷成立了歌咏队进行抗日宣传,《五月鲜花》、《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长城谣》等都是群众最喜爱的歌曲。一些群众表示,唱起歌来往住

① 洪长泰:《生与死的节日:中共的通俗政治文化》,《“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论文选集》下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1 年版,第 913 页。

② 王海光:《旋转的历史——社会运动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92 页。

③ 朱敏彦、齐卫平:《上海抗战文化的发展与抗争》,《上海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35 页。

④ 田汉:《关于抗战戏剧改进的报告》(1942 年),《戏剧春秋》第 2 卷第 2 期。

使他们满怀激情,几乎忘了身处困境。

3、展览形式和传单标语形式

展览形式。该种宣传形式图文并茂,以事实说话,是一种直观的、生动的、具体的宣传教育形式。它通过举办各种展览,吸引人们参观,以进行相应的宣传,具体包括各种实物图片事迹展览、美术展览等等。如之江大学的商学会在1941年举办了中国经济地理展览会,宣传祖国大好河山、丰富宝藏,既有地图图表,又有文字、模型,激励了同学们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

传单标语形式。这种形式以简练的语言,高度概括宣传的内容、目的、任务,简单明了,使人一目了然。一个口号、一条标语口号,虽然寥寥数语,但它往往是一个观点、一条意见、一项主张,含有较大的信息量,利用广大人民群众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的事例,来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如“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永安、先施、新新、大新、中国国贸五大百货公司在其地下党员的影响和带动下,在商场、橱窗、柜台和食堂内外,张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抗日救亡,人人有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慰问和支援前方抗战!”等标语口号,从而使整个商场充满浓烈的抗日气氛,也深深教育和感染了来购物的民众。^①

当然通过工人夜校、读书会、读书小组等形式把群众组织起来以便进行集中教育,这也是一种宣传方式。在抗战时期,工人夜校在宣传教育群众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如在孤岛时期,以各种形式创办的工人夜校不下二三百所,据不完全统计,将近六七千工人参加了夜校学习^②,而且上海各主要产业部门几乎都有工人夜校。工人通过夜校学习,提高了政治觉悟和组织能力,为党面向生产、深入工厂,培养了骨干力量和工运领袖。对此毛泽东曾经肯定了上海

①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上海店员与职工运动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47页。

②张祺:《上海工运纪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1年版,第106页。

地下党举办职工夜校的做法,指出:“在敌伪统治地区,一个工厂办一所夜校,组织几百工人读书学文化、求进步,就等于办了一个工会。夜校工作值得提倡和推广,要继续办好它。”^①

(二)切实的宣传内容

抗战时期上海地下党的政治宣传工作,从宣传教育的内容来说,主要就是对民众进行抗日和反对汉奸教育,以“启发他们的民族思想、正义感(观)念和国格人格意识”^②。这一时期,上海地下党在具体开展宣传工作时特别注意宣传工作的针对性,因为不同的群众在不同的时期,往往会有不同的心理需求,只能接受他们喜闻乐见和符合他们思想基础的内容,这就需要宣传工作的针对性,因材施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结合现实开展宣传教育,激发民众的民族情感

当时深入基层的党员,在宣传教育群众时,往往结合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上海的政治环境、民众的悲惨遭遇,有针对性地宣传党的全面抗战、持久战路线,克服群众厌战情绪;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战绩,增强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心。如抗战爆发后,上海租界涌入大批难民,难民的基本群众是广大的工农群众,因而对他们进行团结教育对于党开辟群众工作有着重要作用。为加强难民教育,打入难民中的党员们对难民进行了“谁养活谁”、“世界是工农造”、“人民是国家主人”等教育,启发难民的阶级觉悟。同时地下党在编写难民教育的教材时,常把难民自身的遭遇与日本的侵略联系在一起,如每当难胞读到“家也烧了,东西当的当光、卖的卖光,几天尝不到饭的味道”,就联想到自己家破人亡的遭遇,忍不住声泪俱下,课文中“这都是东洋人害的!”写出了他们的心声。深入浅出的课文内容,通俗易懂的说理,激发了难胞们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抗日到底的爱国激情。

^①张祺:《上海工运纪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1年版,第106页。

^②《关于新环境下上海组织工作的决定》,《党史资料丛刊》1985年第2辑。

“参加新四军,打日本鬼子去”成了青年们讨论的话题。^① 这一宣传策略的效果是显著的。经过宣传教育,难委先后3次向皖南新四军输送了约1200余名青年,其中有党员80余人;先后抽调党员、骨干约四五十人,赴浦东、青浦、嘉定和苏常太、苏北等地开辟抗日武装斗争;向上海市郊和苏南、苏中抗日游击区输送了近2000余人。^②

2、结合传统的纪念日开展宣传活动,增强民众的自信心

中国共产党一向非常注重利用纪念日来开展群众运动,因为每当纪念节时,群众情绪往往比较兴奋,或渴望了解纪念节的意义,党乘此机会来进行宣传活动,对于提高群众的情绪、宣传党的主张,最能获得独特的效果。^③ 如在建党初期,党利用“五一”劳动节,“三八”妇女节等,举行示威游行、公开演讲等宣传活动,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常常利用“一二八”纪念日、“九一八”纪念日、“七七”纪念日、“八一三”纪念日等传统纪念日和圣诞节、元旦、春节等节日开展宣传活动,以提高群众的抗日情绪及对自己力量的信心。1937年,在纪念“九一八”抗战6周年前夕,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提出全市举行“精神国防运动”,中共上海群委指示各协党团把“形式上的纪念变成扩大抗日救亡宣传”的实际行动。在纪念“九一八”抗战6周年的当天,上海地下党的各基层部门动员40多个团体5000多人上街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奸淫烧杀的罪恶行径,并庄严宣誓:拥护政府,服从领袖,牺牲一切,抗战到底^④。宣传日使广大群众受到一次深刻的抗日爱国教育,“宣传工作的效果超过前些年的任何一年”^⑤。又如在纪念双十节的当天,文协、职协

①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8页。

②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3页。

③《陈修良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页。

④《立报》1937年9月18日。

⑤《群委工作报告》(1937年9月24日),中央档案馆藏。

动员了 350 多个宣传队和 40 多个慰劳队上街宣传,上海抗敌后援会宣传股在事后的总结汇报中这样写道:“双十节虽斜风细雨,天容黯淡,而全市国旗飞舞,白日生辉,各商店对日经济绝交的标语,触目皆是。正午,各繁盛区域都被宣传队所占据,且有结队狂驰于马路中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呼声,如春雷振发。此时虽大雨如注,但民众皆冒雨鹄立两侧,欢呼鼓掌。这种情形,真使我们兴奋得热血沸腾。”^①

3、结合捐献劝募、救济工作等开展宣传工作,促进各项工作的互动

在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注意把对民众的宣传教育与民众实际参与行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动员式的政治宣传,激发了上海民众的爱国热情,而这种热情又在实际行动中转化为对爱国捐献、节约献金等活动的积极参与。在抗战过程中,上海始终穿插着许多公开的社会活动,如对日经济绝交、劝募救国公债、慰劳前线将士、捐献慰劳品、义卖义演、安置难民、抵制日货、劝募寒衣等等,不断把党的宣传工作推向高潮。在当时基层党组织经常采用的一种宣传方式就是把抗日歌曲与募捐等活动联系在一起,如当时有一首《抗敌募捐歌》,歌词是这样的,“你一角,我一毛,涓涓滴滴,积起江河,便成怒涛。只要我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众志成城,定把中国保”^②,这一宣传方式激起了民众的抗日热情,许多同胞感动得热泪盈眶,纷纷解囊捐款。在抗日战争和各项工作的互动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成为民众爱国情绪的典型表达。仅至抗战爆发不久的 9 月 10 日为止,全市已募得爱国捐款 150 余万元,至 10 月 9 日累计发行救国公债 1900 余万元。^③ 各界民众捐献的各类食品、日用品、车辆等军

^①《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档案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78 页。

^②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1991 年版,第 66 页。

^③《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档案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14—515 页。

需物质近 200 种。各团体组织的车辆运输队,源源不断地把物品运往前线。

4、结合适当的宣传口号,引导民众开展斗争

在“左”倾错误统治时期的白区,地下党员在开展宣传工作时,往往不顾上海的实际环境,提出不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的口号,如“拥护苏维埃政权”、“武装保卫苏联”等。其结果不仅使党的力量遭到破坏,也削弱了党的群众基础。对此刘少奇总结道,在白区群众工作的开展过程中要注意找出为群众所拥护的适当的要求与口号。^①抗战爆发后,为支援前线,争取抗战的胜利,上海地下党提出“节约救难”、“一分钱慰劳将士爱国捐”、“节约献金”等宣传口号。孤岛时期,面对日伪的渗透、接收,为护关提出“反英日协定,不与敌伪合作”、“保护海关主权”、“反对悬挂伪旗”等宣传口号;为反对敌伪对上海教育界实施的所谓“亲善教育”,提出“师生合作”,“保护学校”,“保护教育主权完整”的护校口号;为抗议日军暴行,提出“民族共愤”、“勿忘复仇”、“精神不死”、“遗恨必雪”等口号;为开展改善职工生活运动,提出“患难相扶”、“共存共亡”、“同舟共济,共渡难关”,“维护工人生活,劳资互助互让”等口号。抗战临近胜利时,一些支部又提出“吃萝卜头”、“拥护共产党主张”、“要和平、要民主”等口号。党组织在不同时期,根据上海的实际状况,提出适当的宣传口号,其结果不仅使党的政策转化为群众的行动,也使社会各阶层在口号的带动之下更加凝聚在党组织周围。

三、抗战时期上海地下党政治宣传工作的社会功效

政治宣传本身即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它是改变社会民众态度、意见和舆论的重要工具。从某种程度来说,政党的政治宣传工作是人们获得政治信息的主要来源,也是人们了解政治行为与政策的重要途径,它提高了政治信息的普及化程度,“它最明显和最重要的影

^①《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0 页。